

汲古阁集笺校

毛
晋
著

朱新华
彭尚炯
周志强
张卫

笺校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汲古閣集
箋校

毛

晉

著

朱新华

周志强

彭尚炯

张卫

箋校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汲古阁集笺校 / (清) 毛晋著; 朱新华等笺校.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9. 9

ISBN 978-7-5473-1515-6

I. ①汲… II. ①毛… ②朱… III. ①古典诗歌—诗集—中国—清代 IV. ①I22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2189 号

汲古阁集笺校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515-6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出版部调换或电话 021-62597596 联系。

“《读书台》文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李 烨

副主编 叶黎侬

编 委 卢 诚 苏 醒 周冬英

袁 俊 付凤娟

“《读书台》文丛”总序

李 烨

说起来,我们的导读刊物《读书台》在2014年创刊时是临阵磨枪,当时为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的一个评奖活动而编了两期。收效似乎不错。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老所长陈辽先生一直以为《读书台》是由一个团队在运作。陈辽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对常熟图书馆的《读书台》给予了很大帮助。然而,突击只能应急,《读书台》要长期办下去,而且要办好,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这是我们后来的认识。从2016年开始,我确立了要把《读书台》从平面办刊发展为立体办刊的方针。所谓立体办刊,一是定时开展“《读书台》读者沙龙”活动,邀请文学艺术各门类、各领域的知名人物来常讲课,通过讲评、赏析,使读者开阔视野、提高阅读和鉴赏能力(我们已请到了陈子善、韦力、刘心武、李立新等名家来常讲学,效果也很好,很受读者欢迎);二是适时推出“《读书台》文丛”,形成《读书台》的品牌,成规模,成系列,提高影响力。“《读书台》文丛”的着手编辑和出版,是有亮点的。如果一年一年积累起来,形成规模,则极其有价值。“《读书台》文丛”的定位:地方的、研究的、文献的;以文史哲为主要内容,兼顾其他类别的著述,分辑编纂,整体呈现常熟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具体来说,要做到系统性、整体

性、学术性、经典性相统一,达到抢救文献、保存精华、服务社会的目的。力求使“《读书台》文丛”成为一部广泛收集有关常熟的原创性研究著述及文献史料的综合性乡邦文献丛书。

“《读书台》文丛”的定位中,“地方的”就不用再解释了。也就是说,“《读书台》文丛”由两个系列构成:一是“研究的”,二是“文献的”。在此,我重点谈一谈和常熟文献相关的话题。

一、常熟文献的基本情况

常熟作为吴文化的重镇和江南文化的代表,历史悠久,从古至今积累了大量的文献。据《重修常昭合志·艺文志》记载,从商代至民国,已知的常熟著作者就有2 000余人,著述5 000余种。另据调查,常熟现存珍贵的历史文献在1 000种以上,所以常熟也堪称文献之邦。这些文献的特点鲜明:1. 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这种特性包含了丰富的地方经验,它的珍贵和独一无二是它的价值所在;2. 资料性,客观公正全面地记载一地之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史实);3. 综合性,记载常熟一地之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面貌,内容广泛,涉及百科各业,举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人物、风俗,各种门类应有尽有。不但记大事要事,也记有意义的小事,乃至奇闻逸事(譬如钱希言的《猗园》、郑光祖的《一斑录》);4. 连续性,所记各类事物,探本求源,发展变化的轨迹十分清楚、明了。

常熟历代文献现主要保存在常熟图书馆和常熟博物馆。因此,我也就有足够的底气来开展这项工作。当然,我们还应把眼光投向全社会,因为还有不少文献是藏于民间的,就我们调研所知,譬如民国时曾任常熟县代县长的曹弘的《画月录》(笔记)、《午生诗稿》就在曹氏家族后人的手中,还有如著名学者王古鲁的文献资料

也由他的外孙收集了不少。为了确保“《读书台》文丛”成为传世精品,我单位将组织专家学者对现存常熟地方文献的种类、数量、保存现状以及收藏地点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在编纂过程中,坚持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规律的原则,以常熟图书馆、常熟博物馆馆藏为重点整理对象,并注意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的文献,以及流散在民间和国外的各类文献精挑细选,以使长期被束之高阁的常熟文献借“《读书台》文丛”这个平台获得新生。

我甚至设想,“《读书台》文丛”中的“文献”系列可以是这样的规模——

第一辑:史迹汇辑,收录反映地方史料的专著和笔记。

第二辑:方志丛编,收录常熟历代地方志(自南宋庆元二年至1949年的750多年间,常熟编修的地方志书,共40余种)。

第三辑:年谱家乘,收录地方名人年谱和望族的家谱。

第四辑:人物传记,收录常熟名人传记、墓志资料。

第五辑:先贤文存,收录历史上常熟人的诗文和专著的精华。

第六辑:总集汇编,收录常熟历代文献总集。

第七辑:闺秀别集,收录常熟历代女诗人诗文集。

第八辑:虞社菁华,民国期间虞社期刊汇编。

.....

二、整理常熟文献的意义

利用前人留给我们的丰富文献,可以对社会发展的过程、走向、结果作有意义的考察。文献除了具有历史属性,更有现实的价值。今日社会之生命根系,均存在于历史的土壤中,与历史有割不断的血脉;当下事物运动之规律,从文献中也可寻求到借鉴与经

验,因此对未来也有启示作用。乡邦文献之珍要,堪称卷帙浩繁,蔚为大观。这些文献不仅对常熟一地具有重要价值,它也是江南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了解历史、传承文明、建设现代社会的重要参考,可发挥所谓“资治、存史、教化”之积极作用,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再立新功。

文献整理是对地方文化研究和保护的最基础性工作。先人讲“文献无徵,后生之责”,所以我们当代人有责任和义务把文献整理工作做好,为此要加强对地方文献整理的文化意识。

以往的整理(或搜集)的成绩和问题并存,似乎也是明显的。我们看到:1. 零星的常熟文献被编入其他丛书(不是常熟编纂的),不成体系,整理上也较粗疏,譬如,《海虞风俗记》已列入“中国风土志丛刊”,由广陵书社出版;《海虞诗苑》《海虞诗苑续编》已列入“苏州文献丛书第二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等等;2. 由于常熟历代文献大都是孤本、抄本,借阅会使得这些文献的保存愈来愈艰难,借阅会造成纸张污染、发脆、损坏,加上文献的自然老化,这些资料毁于一旦的情形最终将不可避免。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推出“《读书台》文丛”也就有其必要性了。由我们具体负责地方历代文献的整理,充分体现了图书馆工作在现阶段的主导地位和历史责任感。整理、出版常熟历代文献,是利用现代印刷技术,推进标校工作,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文献。当然,由于这是有史以来对常熟历史文献的首次系统整理、编纂,拟收入的文献有许多是孤本、精抄本,有不少是“镇馆之宝”,因此整理工作要有部署、有规划、有保障。作为一个系统的文献工程,方法上可参考“文丛”的编纂法,遵循学术规范,精益求精,选择其中的精华、选择有代表性的,可以先遴选几十种,逐步整理,统一

步骤,积累规模,最终完成常熟历代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

在中国历史上,《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包括了经、史、子、集四部3400余种79000余卷的图书,总字数达10亿,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常熟文化源远流长,存世文献数量庞大,因此进行较大规模的整理虽在体制上不能与《四库全书》相媲美,但在以纵览千古的魄力和毅力致力于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方面,其意义却是可以直追《四库全书》的!希望能把“《读书台》文丛”编纂成“常熟的《四库全书》”。

国运昌隆,盛世修典。我们精心打造的这套“《读书台》文丛”将以崭新的学术角度和现代学科框架对地方文化进行全面梳理和弘扬,站在时代的高度,充分展示常熟深厚的历史底蕴,彰显先贤哲人的智慧,解读常熟文化的独特个性,提升人文精神,古为今用,开启未来,造福子孙,功垂千秋。对此,我很有信心。常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市领导也明确指示要“依托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的独特优势,大力实施文化强市工程,用大视野看文化、用大格局做文化,放大历史文化名城效应,不断丰富‘精致’内涵,将凝聚起建设新常熟的强大动力”。精致城市,美丽常熟,文化工作,大有可为。

在此我诚意邀请朋友们加入我们的作者、整理者队伍,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把“《读书台》文丛”打造成一部在历史上站得住、文化史上留得下、学术界传得开的传世经典集成——添砖加瓦。积跬步而能致千里!是为序。

2016年9月

相比于藏书家、出版家的身份，毛晋作为诗人，名声显然要小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诗歌创作确实不是他的“主业”；另一方面，他藏书和出版的成就实在突出，诗名难免为那两方面的盛名所掩。

毛晋有漫长的学诗、作诗经历。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他有一段自述：“余自丁巳岁，治诗叔子魏师之门，得尚友诸君子，辄以诗篇见赠，或遥寄邮筒，或分题即席，不揣矢和，迄今癸未，纸墨遂多……”（《和友人诗》卷首）顾梦麟《〈和友人诗卷〉序》也引毛晋语：

“且吾所与游，由丁巳迄癸未。”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十九岁的毛晋入魏冲门下，这是他学诗的起点。不过，崇祯十六年癸未并非毛晋诗歌创作的终点。癸未只是毛晋为《和友人诗》作题识的年份，此后毛晋并没有停下他的创作步伐。毛晋卒于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七月二十七日。就在这个月，毛晋还作了《秋月次韵酬牧云上人》。因此，可以说，他诗歌创作的时间跨度达四十余年之久。

而且，毛晋的诗也确实有相当水准。陈瑚说：“子晋之诗，体备

众妙，美非一伦。”（《〈和今人诗卷〉序》）金俊明说：“今读斯编，何其幽异古隽，苍翠欲滴，奇芬扑人也。剔抉隐翳，似稗官史流；考验时物，似老农月令；康乐之奥博，多形于山水；靖节之高古，偏放于田

园。其信然欤？”（《野外诗卷》序）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毛晋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卷二十二“毛晋”条说：“隐君问业于愚山（按，应为“虞山”，指钱谦益。《诗话》最早为嘉庆扶荔山房刻本，疑因乾隆列钱氏为“贰臣”，禁毁其著作，涉违碍而改）及魏孝廉叔子，性好储藏秘册。中年自群经十七史以及诗词曲本、唐宋金元别集、稗官小说，靡不发雕，公诸海内，其有功于艺苑甚巨。韵语有《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大约和平之音，无镂肝铄肾之苦。《过徐元叹落木庵》云：‘十年离旧榻，贺九又重登。山翠连村合，花香绕屋凝。寻僧过略彴，呼酒洗瘳藤。重觅题诗处，苔封厚几层。’《移竹编篱》云：‘活竹移来带野泥，安排疏影与檐齐。归鸦顿失常栖处，稚子难寻旧钓堤。晓露润生根畔草，晚风吹断隔邻鸡。老僧相伴逢迎少，话到斜扉落日低。’”方外挚友释通门也说“放怀读君诗，烂熳抒天机”（《隐湖倡和诗》卷下《琴川回棹潜在特来追访余之所至翁亦至焉入破山抵云半居直达郡之西华皆先后不数日而余又过石湖滨西资精舍松陵之折芦庵所谓池上也翁谓余踪迹杳不可即叠韵相寄余读之喟然有答》）。真率自然的“和平之音”，是毛晋诗风的典型特征。陈瑚在《〈和今人诗卷〉序》中概括了明代诗风的衍变历程：“其初风气深厚，作者大都含醇而酌雅；其继则文明开，英华褻，浸淫至七子之季，而浮靡极矣！一变而巧凿，再变而瘠微。风雅之道日杂，而一代之气运遂相与为终始。”毛晋的诗一改明诗的积弊，呈现出一种清新的气象。他的四十多首《田园杂兴》最能代表其风格。

朱彝尊说毛晋诗“大约和平之音”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不过，如果因此认为毛晋的诗只有“和平之音”那就错了。正如鲁迅论陶渊明所言，陶诗并非“浑身静穆”，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昆承

湖(隐湖)边的汲古阁一带,常被毛晋的朋友们描绘成一个桃花源般的世界,但生当明清之交那样一个乱世,毛晋不能无视人间悲苦和国家兴亡,他笔下的许多诗作抒发的是忧愤抑塞之气。

《和古人诗》中的《鸣雁行》是乐府旧题,最早的鲍照诗,收录于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八《杂曲歌辞》,后李白也有拟作。清王琦《李太白集注》引胡震亨语曰:“鲍照本辞,叹雁之辛苦霜雪,太白更叹其遭弹射,似为己之逢难寓感,观湘、吴一语可见。”毛晋此诗,在叹雁遭弹射之余,结尾忽然翻出新意,叹流民之苦难:“流民如鸟知多少,犹恐流民不如鸟!”《和今人诗》中的《卖儿行次王敬夫韵》让人联想到杜甫的“三吏三别”,诗的最后发出了愤怒的呼号:“君不见豪门金高状日骄,豢养僮仆多腾骠。鲜衣索钱嗔怪生,谁识他人母子情!岂知仁暴各弄态,贫富何曾有定形。呜呼!安得重逢粒米狼戾之阳春,不见泣涕涟涟卖子人!”与此相似的还有如《和友人诗》中的《再叠前韵代述农家苦》:“村村芒种雨萧萧,不尽催科不尽徭。野哭哀边谈政虎,心寒笑里伏人猫。乌犍卖去驱儿种,青草锄来带土烧。莫道忍饥偏习懒,及辰布谷已成苗。”这种对“不尽催科”、如虎苛政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如此强烈、直接的控诉,在当时的诗中是难得见到的。毛晋屡试不第,他的一生也有种种不如意,但他并不顾影自怜,其诗集中的悲苦之音,几乎都为他人的苦难而发,表现出强烈的悲悯情怀。

明清易代,对毛晋而言,是天崩地裂的大事。《野外诗·题崇禎历(泪书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下)》真实地记录了事发两个多月后,毛晋获知皇帝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自缢的噩耗时所受到的震动。给毛晋带来更多痛苦的是次年南明政权的崩溃和江南的沦陷。他的《和友人诗·途遇一僧见示江上纪事三绝句次韵口号》热

情讴歌江阴人民“一寸心坚抵万师，孤城三月未曾移”的英雄壮举；《和友人诗·和卞枫溪元韵》表达了对“完发见收，縶狱不食死”的节士的敬仰；《野外诗·旧时》其五咏满人颁“易服令”后汉人改易服饰之事，满纸沧桑之感、故国之思。毛晋的诗歌流露出强烈的遗民情怀。徐鼎《小腆纪传》把毛晋的小传安排在卷五十八列传第五十一“逸民”中，是有眼光的。《野外诗·仲木来居池上寄之》其一：“向日登临稀俗客，今朝谈笑有遗民。”他的交游圈中有大量的明遗民，他向许多明遗民伸出过援手。他的立场清晰而又一贯。无疑，毛晋是一个爱国者，尽管以他的个性，不会成为陈子龙式的烈士，但他有自己的方式——不遗余力地搜访、收藏、刻印古籍，传承、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帮助那些不事新朝、生活困顿的人，等等。这是我们读其诗的时候应该了解的。

毛晋一生刻书无数，但他自己的著作大多没有刊行。刘声木《苕楚斋三笔》卷二“毛晋撰述未刊”条说：“常熟毛潜在晋，席屡世余业，藏书甚富，校书甚精，刊书又最宏。前人遗业，赖其搜罗校刊，永传于世，不可胜计。不朽之业，即在于是，故汲古阁之名，照耀海内，垂数百年，实为目录学中一大家。声木谨案：《小石山房丛书》中有《汲古阁校刊书目》一卷、《补遗》一卷、《刻板存亡考》一卷。其中汲古阁主人自撰而自刊者，仅有《香国》二卷、《隐湖题跋》二卷。尚有《明四秀集》□卷、《明诗纪事》□卷、《明方輿胜览录》□卷、《明词苑英华》□卷、《海虞古文苑》□卷、《海虞今文苑》□卷、《虞乡杂记》□卷、《昔友诗存》□卷、《救荒四说》□卷、《隐湖小识》□卷、《隐湖唱和诗》□卷、《永思录》□卷、《宗谱》□卷、《先贤隐湖遗稿》□卷，共十四种，未刊。以汲古阁刊书之精且富，自撰之书，

何难刊刻，其未刊者，仍有如此之多，犹见笃实之遗。以视后世鹵莽灭裂，以撰述刊行，自矜学问者，其用心之相去，有不可以道里计者矣。”（《荑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版）刘氏说毛晋著作仅有《香国》和《题跋》曾经自刊，并不准确，毛晋生前即已刊刻的至少尚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与“明四秀集”中的《明僧弘秀集》。另外，刘氏开列的未刊书目中的“《宗谱》□卷、《先贤隐湖遗稿》□卷”断句有误。这份书目来自《小石山房丛书》本《汲古阁校刊书目补遗》后的附录，原书并无某卷字样。《宗谱先贤》为一书，而《隐湖遗稿》就是我们笺校的《汲古阁集》（以下如非必要，概称“汲古阁集”）。

世传《汲古阁家塾藏板目》（常熟图书馆藏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抄本）也有一份“未刻书目”，内容与《汲古阁校刊书目补遗》所列略同，《隐湖遗稿》后有小字注：“已刻，即毛子晋诗集。”其下列“和古”“和今”“和友”“野外”，显然就是本书四个部分的简称。未刻书后注“已刻”，让《汲古阁集》究竟有没有刻过这一事，变得扑朔迷离。

一般认为，毛晋生前没有刻过自己的诗集。清代常熟文献学家王振声受铁琴铜剑楼主人瞿秉渊和瞿秉清兄弟之邀校订《汲古阁集》时，作了一篇跋，说：“《汲古阁家塾藏板目》载《隐湖遗稿》四种，曰《和古》《和今》《和友》《野外》，注云‘已刻’，而印本顾未之见。”他的表述比较严谨，并没有断言未刻，只是说没有见到过传世刻本。后来的学者比王振声大胆得多。叶树声《试论汲古阁对祖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说：“毛晋这些诗，在其生前只有稿本，尚未刊刻。”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说“至咸丰六年始为付刻”，意思显然是过去从未刊刻。

但《汲古阁家塾藏板目》并非一部可以被无视的无关紧要的目录。沈津《毛晋稿本〈汲古阁集〉》提及毛晋的《汲古阁家塾藏板目》时,把它的著作权归给毛晋。如果真是毛晋所编,那还有谁比他更清楚哪些书刻过,哪些书没有刻过呢?当然,沈津先生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汲古阁家塾藏板目》经部有“许氏说文十五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及,毛晋欲刻未果,最终由幼子毛扆刻成,已在毛晋卒后五十来年(见潘天祯《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的刊印源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2期)。因此,《汲古阁家塾藏板目》应该不是(至少不全是)出自毛晋本人之手。以前也有学者据子部《山居小玩十种》的第十种《香国》条后注“先大父潜在公”、集部《隐湖题跋》条后注“先大父潜在公著”,认定编者为毛晋的某个孙子,这也不可靠。《汲古阁家塾藏板目》附录“未刻书目”各书,肯定是编写者确实认为未刻才会列入。因此,在书名后注“已刻”的应该不是编写者,起码不是编写者在编目时就加注的。“未刻书目”所列各书中,除《隐湖遗稿》外,书名后注“已刻”二字的另有《隐湖倡和诗》。《隐湖倡和诗》是毛晋身后他的儿子毛褒等在康熙二年左右所刻。由此我推测,《汲古阁家塾藏板目》编写于《隐湖倡和诗》付梓之前。当时,书尚未刊刻,故列入未刻书目。后来书已刻成,才有人在书名后加注了“已刻”二字。因而,《汲古阁家塾藏板目》的编者很可能为毛褒等。《香国》《隐湖题跋》后的注既称毛晋为“先大父”,无疑出自毛晋孙辈。《隐湖倡和诗》《隐湖遗稿》书名后的注也可能为同一人所加。

那么,《隐湖遗稿》会不会像《隐湖倡和诗》那样,也是毛晋卒后由诸子刻成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只是尚未见到明确的文献依据。而毛晋生前很可能刻过自己的诗,却有一条重要线索。陆世

仪《桴亭先生诗集》卷四《过毛子晋湖庄流连浹日复赠予和古人诗一册中有过李氏园和杜少陵游何将军山林五首即用其韵以咏湖庄诸胜》，总题下分《载德堂》《汲古阁》《宝晋斋》《此静坐》《宝月堂》五题，均为五律。此题往前推两首为《今岁庚寅值予四十吴敬修以诗见赠依韵奉答》，后一首为《温如先生七十诸同人咸往觞祝欢声浹日先生赋七言一章依韵奉和》。温如先生是陈瑚父陈朝典，陈朝典七十岁生日在顺治七年庚寅（1650）秋，陆氏获赠诗集必定在这一年。当然，陆世仪没有明言诗集是不是刻本，但可以肯定，毛晋决不会把《和古人诗》的稿本赠人。那么，剩下的可能就是抄本和刻本了。顾梦麟《〈和友人诗卷〉序》写到毛晋等人的诗社活动：“朝拈一题，夕而累幅；夕脱一稿，朝而授梓。”陈瑚《〈隐湖倡和诗选〉序》也说：“仿古人月泉吟社、玉山草堂之遗风，酒酣耳热，分韵赋诗。家有剞劂良匠，朝落纸而夕上版矣。”以汲古阁的刻书能力，很难想象，毛晋会请人抄成若干册《和古人诗》分赠朋友。我认为，毛晋赠给陆世仪的，就是刻本。由陆诗还可以推测，当时刻成的只有《和古人诗》，如果四种都已付梓，毛晋仅以一种相赠是不近情理的。不过，我们现在所见的《和古人诗》中有部分诗作于顺治七年之后，如《和白香山我年五十七》，这可能是后来整理《隐湖遗稿》准备全部付刻时增入的。

王应奎的《海虞诗苑》是清代前期常熟诗歌一部重要而且权威的选本。卷二收录毛晋诗两题七首，即《游绮山》和《樵人十咏杂和皮陆韵（十首之六）》。跟《汲古阁集》比对，每一首都有异文。其中，《游绮山》有七个字不同，《樵人十咏杂和皮陆韵》连诗题都不一样，《汲古阁集》作“追和皮陆樵人十咏题退山采樵图”，六首中文字差异最大的《樵斧》，全诗四十字中，竟有二十二个字不同。这表明

王应奎所见不是今天传世的《汲古阁集》。他见到的是不是刻本呢？尽管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这个事实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能不引人深思的。

瞿氏铁琴铜剑楼咸丰刻本到底是否存在，同样扑朔迷离。

丁祖荫 1916 年刻印《虞山丛刻》本毛氏诗四种，他在最后一种《野外诗》卷末作了一篇跋，说：“是帙向藏吾乡罟里瞿氏，文村居士更定为《汲古阁集》，厘成四卷，怱怱镜之、濬之兄弟梓行之，适以庚申之乱未果。”显然，他是主张此本没有梓行的。但更多的人意见相反。

在《徐兆玮日记》出版之前，我所见的资料中最早明确提出有咸丰刻本的是叶树声《试论汲古阁对祖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毛晋这些诗，在其生前只有稿本，尚未刊刻，此稿本于清道光间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瞿氏念及凤苞一生刊布遗书，校讎精核，厥功甚伟，而其著作流传不多，其诗更不为人知晓，为使其流传后世，于咸丰十年（1860）雕付刻印，取名为《汲古阁集》，仅刷样本数部，不慎于火，板片尽毁。之后常熟丁祖荫又重刊印，收入《虞山丛刻》。”（《江苏图书馆工作》1985 年第 3 期）后来，沈津《毛晋稿本〈汲古阁集〉》也说：“此稿本清道光间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由于瞿氏念及毛晋一生校讎，刊布遗书，厥功甚伟，而其著作流传不多，诗更不为人所知晓，为了不使毛晋自著湮没无闻，故延请乡贤王振声（文村）为之勘校，将卷端原题《和古人诗卷》改题为《汲古阁集》，并于咸丰十年（1860）据毛氏稿本刻板印行。板成，即刷印数部样本，然不慎于火，板片全毁。后来常熟丁祖荫设法借得此稿重新为之刊印，收入《虞山丛刻》。今藏常熟市图书馆，为瞿凤起先生所捐赠。”（《书城挹翠录》第 339 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